

梁啟超詩文選

方志欽

劉斯奮

編注



# 梁启超诗文选

方志钦 刘斯奋 编注

广东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诗文选**

方志钦 刘斯奋 编注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75印张 4插页 459,000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 10111·1221 定价 2.45元



梁启超像

勤西倍孝

九寫開益

夷六定時

戎器有

北寓張

震南騫

五苞廣

狄八通

東靈風

燕謀仁兄  
梁啟超

梁啟超手迹之一

少學琴書，好愛閑靜。開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  
聲亦復歡然。有嘉客，于五六月  
中，臥北窗下，遇涼風，正謂是羲皇  
上人也。

伯任  
梁啟超

梁啟超手迹之二

## 出版说明

《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向读者提供有关广东地区的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其他方面的文献，以便专业和业余爱好者参考和研究之用。这套丛书内容比较广泛，不固定册数，分期陆续出版。《梁启超诗文选》是其中的一部。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爱国者、启蒙大师和维新派主将之一，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有成就的学者和作家。他的文章内容广泛，风格独特，曾风靡一时；诗词热情奔放，不拘于传统形式，在当时的“诗界革命”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本书从梁氏千余万言的著作中选取较重要的部分，其内容反映作者各个时期的政治态度、学术见解和思想感情。书中有选编者简明的注释和扼要的题解。

## 前 言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以追随他的老师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而著名于世，两人并称“康梁”。

梁启超活着的五十六年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多事的年代，是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日益加深、人民革命斗争日益高涨的年代。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象惊涛骇浪，接二连三地给梁启超以巨大的冲击，并把他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让他扮演各种妍媸异态的角色：或正面，或反面，或主角，或配角。历史的复杂性和梁启超本人的多面性，使他在人们的眼中显得时而高大，时而渺小，时而先进，时而落伍，时而正确，时而错误，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其复杂的程度，竟至于：即使他在最佳政治状态下，其思想行动上也有某些消极的东西；即使他在最坏的政治状态下，其思想行动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而他在政治上反动的时候，在学术上也还是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就更增加了后人研究和准确地评价梁启超的困难，以致迄今尚众说纷纭，毁誉不一，不能论定。但是，梁氏在中国近代史上确是一个重要人物。无论如何，他的历史作用是不能抹杀的。他所留下的一份历史遗产，仍然是珍贵的，值得我们认真地批判继承。

梁启超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其分界线是在1904年。1904年以前，是他的政治生涯的向上时期。这个时期应从



1890年他跟随康有为学习并开始从事变法维新事业算起。这时期梁启超的主要活动是：在广州万木草堂学习和充当康有为教授弟子、鼓吹新学、著书立说和“公车上书”的助手（1890—1895），在上海办《时务报》，进行政治鼓动，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1896—1897）；在湖南时务学堂执教，培养维新人才，并积极参与湖南的维新运动，提出一系列改良政治的建议（1897—1898）；追随康有为投身戊戌变法运动，并成为运动的主将之一（1898）；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较全面系统地宣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提倡君主立宪下的“民权”，在舆论界发生深远的影响，因而名声大噪，进入一生政治活动和思想发展的高峰（1898—1908）。上述这一时期，梁启超的著作都是与他的实际活动相适应的，大体表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趋势。1904年，是梁启超人生旅程上的重大转折点。从这一年起，昔日潜伏在他身上的保守性渐起主宰作用，并且贯串着他的后半生。进步的因素虽未完全泯灭，且时有表现，但已越来越少了。这个时期，梁启超的主要活动为：在《新民丛报》发表保皇言论，与革命派进行激烈的论战（1905—1907）；暗中勾结清朝一些权贵，参与酝酿和开展“预备立宪”的活动，其后又参加策划“国会请愿”运动，企图阻遏革命的爆发（1905—1911）；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反对革命党人（1912—1915）；至袁世凯称帝，则起而反对，参加护国之役（1915—1916）；又曾反对张勋复辟，但随即依附北洋军阀段祺瑞（1917）；晚年由于沉沦失意，逐渐息影政坛，从事著书讲学，直至病逝，虽未忘情于政治，不时发表政见，但政治已经不是他的主要活动（1918—1929）。

梁启超的一生是复杂多变的一生。其著作论点的多变均由

此而来。如何理解和分析研究梁启超其人其行其文，如何准确地把握他的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实质，确是一个难题。他的思想脉络很难笼统地用“进步”或“反动”来概括。即使是加以“前期”、“后期”之分也不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其实际。因为过于简单的划分，就会或不免忽视梁启超不论前期和后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保守性和反动性；或不免抹杀他前期的进步性和后期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这就不可能概括梁启超这个人的思想全貌。在此，我们试以“爱国”二字作一概括，并以之作为考察和理解他一生思想脉络的依据（诚然，“爱国”是有阶级性的，它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惟其爱国，所以梁启超作为一介书生，才能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成为变法维新的健将；惟其爱国，所以他始终以“改良”祖国，使之能立于“竞争”之世为职志，毕生探求中国富强之道（虽然在探求中屡犯错误）；惟其爱国，他即使在政海沉沦中，仍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过帝国主义的侵略，抨击过清皇朝的腐败，反对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祸国，不致一沉到底；惟其爱国，所以他从青年时代起，便以“新民德”、“开民智”为己任，成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启蒙大师之一；惟其爱国，他孜孜不倦地用新的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古老的文化遗产，写出了大量的著作。问题在于他所选择的是一条改良而非革命、妥协而非战斗、自上而非自下而上的道路，所以在急剧变化发展的形势下，终不免于一再碰壁。碰壁之后，他虽屡变其口号，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不肯放弃其改良的宗旨，所以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最后钻进反动政治的死胡同中，不能自拔，在失意中了其余生。这是梁启超的悲剧。

梁启超不仅是个早熟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个早熟的学者。

他自从十七岁（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之后，即走上了从政和治学的道路，一身而二任。和康有为一样，梁启超身上有着异乎一般政治活动家的浓厚的学者气质。康有为托古改制，言必引经据典；早期的梁启超也是如此。后来他虽不言“改制”，但言必中学西学并举，诸子百家杂陈，旁征博引，使人有目迷五色之感，但骨子里仍以儒学为宗。如果说他在各个时期写的政论，学者气味颇浓的话，那么，作为一个以“改良”政治起家的人物，梁启超在学术方面，却又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气息和真切的现实感。虽然他赞赏“为学术而研究学术”的观点，但他自己却没有做到。他的学术著作，不论是中学方面的还是西学方面的，都是有所为而发，根本就没有无的放矢的“纯学术”。就连他写的小说，也是“政治小说”，他写的诗词也多半是“政治诗词”。而这又正是他与同辈的许多学者不相同之处。要而言之，梁启超的学术，是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学术。

梁启超的著作，中学与西学兼容并包。对于西学，他是把它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来探求的，其目的是为了借鉴而不是生吞活剥。这就是用中国人的批判的眼光（其眼光不当之处甚多，且当别论）去研究，而不是用洋奴买办的眼光去研究。对于中学，他是用近代人——懂得一些西学知识的近代人的批判的眼光（其眼光不当之处甚多，且当别论）去研究和整理，而不是用抱残守缺的老学究和卫道者的眼光去研究和整理的。在治学方法方面，他兼采中国古代学者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之长，从内容到体例都另辟蹊径，不落前人窠臼，见解新颖，对当时学术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这方面看，也可以说是同辈学者无与伦比的。他的著作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东西甚多。当然，其中包括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

不论从政还是治学，梁启超主要靠一支笔。这支笔，“笔锋常带感情”，“下笔不能自休”。由于他才思敏捷、目光锐利、学识渊博，加上他自办自编报刊，可以随兴之所至执笔为文，无所拘束，无所限制，所以终其一生，写下了至少二千万字的著作，真正够得上“著作等身”了。其著作之多，同代文人学者，无出其右。其著作内容甚为广泛，几乎包括了整个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举凡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理财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经学、佛学……不胜枚举，而文艺创作如小说、诗词之类，也有相当数量传世。这也是同代文人学者无出其右的。

梁启超的文章，无论文体、文风，均自成一家。特色是通达流畅、生动活泼、浅白易懂，有较充足的理论分析，讲究逻辑推理。其为政论，则尖锐泼辣，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和鼓动性；其为学术著作，则别开生面，深入浅出，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所以这种文体行世以后，立即风靡一时，“学者竞效之”，一扫晚清文坛陈腐晦涩之颓风，开创一代活泼清新之气。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著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不少毛病，例如：文字冗长拉杂，欠于简炼；文风浮夸，言过其实；好旁征博引中外古今典故以炫耀学识，有失质朴；立论好走极端，不免失于偏颇；观点时常改变，今是而昨非，不免自相矛盾；著述面过于广泛，不免流于浮浅；多一挥而就之作，不免推敲不足，失于粗疏。尽管如此，这种“新文体”却成为中国散文要冲破旧文体的束缚，向白话文过渡的历史趋势必然到来的预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不容否定的地位。

梁启超还和黄遵宪一起提倡过“诗界革命”。他于流亡的初期写的诗，热情奔放，直书胸臆，明白流畅，表现出一种乐观

和追求理想的精神，一种打破传统形式、自求解放的趋向。这是他的诗歌理论的直接体现。后期创作追求功力，诗风也趋于典雅深密，与少作相较，却是大异其趣了。

要从篇幅浩大、种类繁多、观点多变的梁启超著作中选出三四十万字的代表作是很不容易的，难免出现顾此失彼、以偏概全、畸轻畸重的毛病。这里既牵涉到如何评价梁启超毕生活动的问题，也牵涉到如何看待和取舍他的著作的问题。编者限于水平，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把握，只能根据现在的认识去处理。处理的第一个原则是：按著作的性质来说，着重选取政治性的，学术性的次之，诗词又次之，小说不选。为什么？因为梁启超首先是个政治活动家，其次才是个学者，再其次才是个诗人，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虽说把他的政治著作放在首位，但所选的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难免挂一漏万。学术著作的选取更不成比例，因为这类专著每部动辄十数万字以上，难于摘录，只能选些序言或导论之类，以见作者的学术思想、治学态度和方法的一斑。所选诗词，在本集中虽占字数最少，但与作者全部诗词的比例，却大于所选文论与其全部原著的比例。因为我们考虑到：一则这类抒情感事之作多是作者真实思想的流露，对于读者了解梁氏其人，不无帮助，而过去研究者却对此留意较少；二则梁氏作为“诗界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其作品的变化，可反映此事的兴衰；三则在本书中所占分量不大，却可以增加读者的兴味。处理的第二个原则是：尽量选取原作在发表时有重大影响者，或虽无重大影响，但可反映著者某一思想倾向或侧面者。原则之三是：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的题材、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篇幅（长或短）的著作，在选取时力求兼顾。以上三个原则是否合理，有待读者品评。

蒙中山大学中文系商承祚教授为本书题字，谨此申谢。

由于编者学识浅陋，对梁启超的著作又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编这本集子一定有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切盼学者、专家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二年十月

## 凡 例

一、本书选材主要根据一九三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间参照原发表报刊及有关书籍。

二、选录原则以反映著者一生各时期的思想言论为主，并兼顾各方面，力求较适当地体现著者的思想面貌和著作特色。

三、本书内容按政治论文、学术论文、诗词分为三大类，各类著作均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每篇均作简要题解及注释，并加标点。

四、原文个别明显的错字，均由编者直接改正，不另注明；疑有讹误及其他问题之处，均在注释中说明。

五、文章中的著者原注均置于正文相应处，加上括号，以资识别；诗词中的著者原注，均列于每首诗词之后，标明是著者原注，以免与编者注混淆。

# 目 录

前 言	1
凡 例	8
诗文选	
〈一〉政治论文	1
变法通议(选录)	2
自序	3
论不变法之害	6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28
学校总论	82
论科举	46
论学会	68
论湖南应办之事	71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	85
保国会演说词	92
立宪法议	99
释革	110
开明专制论(选录)	119
第八章 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	120



暴动与外国干涉	167
现政府与革命党	194
政闻社宣言书	208
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	225
粤乱感言	235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239
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	249
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	261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266
反对复辟电	290
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	296
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	307
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	314
〈二〉学术论文	319
西学书目表后序	320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327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选录)	339
例言七则	340
发端	342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选录)	349
总论	350
中国历史研究法(选录)	357
自序	359
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362
第三章 史之改造	370
先秦政治思想史(选录)	384